

今日評論

第五卷 第三期

---

這一週

抗戰時期的西化問題

談所謂文化膏藥問題

工業與交通

法國最近的外交政策

卮 鬱

陳序經

蔡樞衡

張德昌

周信銘

汪曾祺

---

民國三十三年正月廿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 這一週

此次解散新四軍事件，是抗戰期中，最可痛心，也最恰當的一件事。新四軍成立已二年餘，當其成軍之始，在江皖一帶，頗有戰功；然而蓄意膨脹，罔顧大局，年餘以來，所至無定，突擊于學忠，沈鴻烈，韓德勤，上官雲相，等所轄部隊之事，亦層出不窮。馴至中央不得不嚴加約束，不得不令其撤退，至無可作祟的後方，及其拒不撤退，則又不得不斷然處置，勒令解散。以有用之師，而降落為妨礙統一的隊伍，當然應令我們痛心。我們痛新四軍的主持者，不效公忠，不效愛國。同時我們也痛中央在始末未能即以極嚴正的態度處之，遂致新四軍改存徵侍之心，而有所最苦的不幸。設或新四軍能一心為國，能以抗敵為重，而彭德懷為首，則對於其他軍隊，又何難？設或中央在始即示之以最嚴正的態度，堅持軍紀，則新四軍又何難多方嘗試，冀可作無畏的進取？負責問責的野心，竟到了絕無回頭的境地，且對於其悔改，設是無可逃避的結果。此種事，愈行愈惡，愈趨愈遠，愈趨愈淺。此次處置的恰當者在此。

政府這次處置新四軍，完全根據軍紀。就軍紀言，此誠是應作斷然處置之事。但實際上，我們也無從諱言共產黨問題的存在。處置共產黨問題的方法，總不外乎二。一是法律的處置方法。凡法律範圍以內的行為皆為合法，凡法律以外的行為皆為違法。如不論何人何黨皆依法律處置，則共產黨的問題即不存在。又一是政治的處置方法。共產黨之所以有若干號召力，必有其因。其所當者，大家應接受之，而當國者尤應接受之。其所不當者，則排斥之。此二法，可擇一而用，亦可兼用。就大體言之，前者較積極，後者較消極，但兩者均應公認之。此次新四軍的解散必引起共產黨方面許多不滿及譏評。政府何不索性將此事斷末，除了有軍事秘密者外，完全公之於世，而以世人益知統一之重要乎？

日人如無法南進，則對中國勢必另有企圖。近來傳言甚多，不是說敵人將於何時何地大舉進攻，便是說敵人正遣派大宗第五縱隊援我後方。實則傳言是不可靠的。敵人客有制空權，故對空襲可故意事先廣播，以增威脅；但在陸上，則兩方軍力早已平分上下，日人焉敢先洩軍機，自貽伊戚？故日人儘可遣師北上或西上以圖一逞，而決不能先以行軍的路線及日期告我。正因此如此，故傳言不可以信，而防範則不能不加密。日人如果真的北上東上，其勢或甚猛，故防衛抵抗的軍隊也須求其精而強。

地中海方面近來頗多德國飛機開到，故本月十日，兩方海空戰的結果，已互有死傷，而不像從前之英軍必勝或義軍必敗，在本月十日的交鋒中，義軍損失甚重，德機飛機十數架，但英有航空母艦，巡洋艦，及驅逐艦一艦均受損傷。都布魯克又並未降落。德機在地中海力量增加，足以使英軍疲於奔命。馬吉爾近又擊滅英人，其用意殆亦在逼英人領回德軍之領事官。

德軍在羅馬尼亞亞者似仍在準備向保加利亞方面前進。但保總理本月十二日的演詞，則可視為保國將與土耳其一致決心守中立，也決心抵抗侵略的先聲。同時，交戰國雙方在巴爾幹的外交活動，近來也益見活躍。此可視為德尚未能或未願以武力攻保攻土的象徵。

白羅斯福於本月六日向國會讀咨文，建議增強國防新法案後，眾院外委會即開始聽取各方意見。自十五日起，赫爾，諾克斯，斯汀生等均先後發表陳述意見，奮辯責難。將卸任駐英使節的甘納第，亦獲得政府同意，作公開演說，以作總統的聲援。對總統政策表示好意的威爾遜則將不日赴英。據說此行將代羅斯福作耳目。由此觀之，國會內的獨立派議員，縱對總統提案有所非難，亦當無作重要修正的實力。果然，則新法通過之日，總統可以自由以美國無限的資源及軍備援助中英希之日，無怪日人聞之心悸，而赫爾痛斥日本侵略主義的演詞，日人不敢對駁，連善味的松岡洋右也要裝聾作啞起來了。

# 抗戰時期的西化問題

陳序經

五年前，我在國聞週報第十三卷第二期發表過一篇「一年來國人對於西化態度的變化」。我會指出七十年來國人對於西化這個問題討論最為熱烈的，要算民國廿四年那一年。我並且指出經過這一次討論之後主張復古的人固已逐漸絕跡，主張折衷的人也已逐漸減少，只有主張根本西化與全盤西化的人日趨日多。從民國廿五年至民國廿六年國人對於西化這個問題的討論雖不像民國廿四年那樣的熱烈，可是國人的態度是趨於根本西化與全盤西化的。七七事件發生以後，不但在理論上我們覺得全盤西化的必要，就是在事實上，我們也是朝着這條路走。所以在文化的物質方面，七七事件以前，還有人提倡「大刀救國」，七七事件以後，這種運動，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了。在文化的精神方面，所謂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不只是一種口號，而且是一種事實。這都可以說是西化的結果。所以我們相信全盤西化不只有可以持久抵抗我們的敵人，而且可以建設一個強有力的國家。

我以為凡是稍能留意於我國近代的歷史與我們目前的需要的人，都很容易感覺到全盤西化的必要。比方蔣廷黻先生在抗戰後所刊行的「中國近百年史」裏很顯明的指出全盤西化的必要。其實，全盤西化不是憑空造說的，而是有了充分的證據以為後盾，有了顯明的事實以為明證。正是爲了這個原因，全盤西化論的主張，不只是對於數千年來的根深蒂固的復古論調加以極徹底的打擊，就是對於八十年來的老生常談的折衷辦法也指出其根本的錯誤。這一點凡願意把數年來國人對於西化問題所討論的文章，加以翻閱的，便能容易明白。

然而這不是說在抗戰時期，國人對於全盤西化的主張是沒有異議的。在抗戰時期裏堅持復古的言論，固已絕跡，可是有意或無意的徘徊於折衷的調

調的著作，比較上值得我們注意的，要算張申府先生所刊行的「文化教育哲學」一小冊，馮友蘭先生在新動向半月刊所發表的「新學論」十二篇，與賀麟先生在今日評論第三卷第十六期所發表的「文化的復興與用」一文。這三位都是學哲學的，而且是以哲學的觀點去解釋西化這個問題。我個人對於哲學原是門外漢，然却感覺到張馮賀三位先生對於文化的根本原理與文化的實際應用却有不少曲解之處，因而草成此篇，以供國人參考。

## 二

分合的觀念——張申府先生是用所謂分的觀念，去批評全盤西化論。在「文化教育哲學」的小冊的「抗戰建國文化的建立發端」一章裏，他以為主張全盤西化的人：

根本沒有了解西洋文化，根本沒有了解西洋文化一個核心的科學的出發點是分，因此所注重的是數量，是分析，是分別，是分寸，爲什麼對於文化要圖待遇？

我們承認科學的出發點是分，同時我們不能否認科學的實體也是合。分是爲着我們研究的便利起見，合是科學的基本原理。植物與動物就有其相本相合之點。普通生物學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乘在這個合的觀點上。其實，科學愈發達，則這個合的觀念，也愈顯明。生物學家像赫胥黎的有名的孫兒，已經告訴我們，生命與非生命的分別的困難已逐漸的增加，自然現象的方面固有其相合之點，文化現象的方面，也有其相關之處。就以張先生所說的西洋文化一個核心的科學來說，科學發達不但文化的物質方面有了劇烈的變化，就是文化的社會與精神各方面，也受了很大的影響。近代文化的物質方面的發展，是由於科學的發達，這是人們所共知的。在文化的社會方面，所謂資本主義的社會，或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無論是直接上或間接上都與科學有

了密切的關係。連了所謂社會的基礎的家庭，也深刻的受科學的影響。因為科學發達，工業發展，不但在形式上，大家庭的制度，逐漸崩潰，就是在功用上，以前的家庭人員，而特別是婦女們，終日忙於自耕自織，自備燃料，自製食品的工作，也大為減輕。因此之故，所謂婦女運動的發展，婚姻自由的主張，也可以說是直接或間接上受了科學的影響。此外在文化的精神方面，比方在思想上，因科學的發達而轉為精密，在迷信上却因科學的發達而逐漸破除。前者的關係可以說是相成的關係，而後者的關係可以說是相反的關係。

總而言之，西洋文化的各方面，既可以因科學的發達而受了影響，那麼假使中國採取了西洋的科學，則不但中國的文化品質方面受了波動，就是中國文化的社會方面與精神方面，也必受了波動。全盤西化的理論的根據，可以說是在文化方面的關係上，與文化有密切的關係。

而且事實上，中國的近代文化，不但採用了西洋科學的理論，而且西洋文化的各方面已經自動的動了西化。就是採用了科學理論與技術的西洋文化如宗教迷信等，也有意或無意的西化。西洋文化的各方面，中國已經採納，或正在效法，固是全盤西化，西洋文化的各方面，中國若能澈底採納，整個的效法，也是全盤西化。其實中國的今日的文化，無論那一方面沒有不受西洋的影響的，所以全盤西化，不只是一種主張，而且是一種事實。但是中國文化的各方面雖受西洋的影響，可惜這種影響不够澈底，所以比方我們雖有輪船製造廠，可是我們所造的輪船，不但質的方面，沒有人家那麼好，就是量的方面，也沒有人家那麼多。而且我們的輪船製造廠，不但所造的輪船，不如人家的好，就是輪船製造廠的組織與計畫，也不如人家的那樣周密。所以主張全盤西化的人，不但主張全盤西化而且主張澈底的全盤西化。

#### 張先生又說

事實上，中國歷史的文化，已受過多度的外來影響，吸收了不知多少當時的新分子。最什麼的從漢起為天空，其次為大食，更次在明末清

初有西洋。中國文化久已不是一個單純的整體了。西洋文化自希臘而發展到現在，更是一個化合物，那麼今日怎麼不可以自覺的把中國最好的東西清理出來，把西洋最好的東西，搬運起來，根據新陳代謝的作用，化出一個更新的東西。

我們並不否認中國文化或西洋文化是一個化合物，不是單純的整體。不過我們也得問問，中國現在有了什麼最好的東西，可以和西洋最好的東西，化合起來而成一個新的文化呢？假使張先生說西洋最好的東西是科學，那麼採取了人家的科學，則中國文化的別方面正像上面所說，必受科學的影響，而趨於全盤西化。其實科學不是西洋的最好的東西，就沒有一個正確的標準，五年的前，西化問題討論得熱鬧的時候，有些人像吳景超先生，就感覺得科學是西洋最好的東西，有些人像張佛泉先生，以為共和國的頭腦是西洋最好的東西。還有些人像劉湛恩先生，又以為基督教是西洋最好的東西。所謂選擇西洋最好的東西，既沒有一個正確的標準，那麼所謂選擇，就無從選擇。其實科學，共和國，基督教等等，都已經來了中國，事實上中國已經全盤西化的路上，不過這些西化還不够澈底，所以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希望科學家專於科學的研究，致力於共和國的研究的人，要得共和國的精神，做基督教徒的人，要有耶穌基督的人格。在西洋，科學，共和國，基督教，既有了密切的關係而可以同時存在，同時發展，在中國，也可以同時存在。同時發展，何況事實上這些東西都已經來了中國，若照選擇的辦法去施行起來，則主張科學為西洋最好的東西的，不只是專要西洋的科學，而且必至於排斥共和國與基督教。這麼一來，結果必使文化趨於一個單純的整體。反之主張全盤西化的人正是覺得文化不是一個單純的整體而是一個化合物或是複雜整體，所以主張文化的各方面，都可以全盤採納。而事實上，也已全盤採納，不過這個全盤，不够澈底罷。總而言之，社會是分工的，你覺得西洋科學是最好的東西，你可以作科學家；我覺得共和國是西洋最好的東西，我可以研究共和國；他覺得基督教是最好的東西，他可以做傳教士。假使因

爲你覺得科學是西洋最好的東西，而主張中國只好取西洋的科學，而不要西洋的共和國，或是基督教，或其他的東西，這是偏見，理論上既說不去，事實上也就做不到。而況人生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一個科學家不但同時可以讀共和國，而且同時可以做基督徒。一個人尚可以同時受了文化的幾方面或許多方面影響，一個國家有了那麼多人，却不能受整個西洋文化的方面的影響，這是說不去的。而況事實上，今日的西洋文化無論那一方面，都已介紹過來。

至於中國文化的優點，直到現在，一般主張保存中國文化的人，尙未能具體的指明出來。五年前，西化問題討論得最熱烈的時候，愛護固有文化者，能舉出我們的文化比西洋的爲優的，並沒有幾個人。比方，梁實秋先生曾提出三點，第一，是中國菜比外國菜好吃；第二，是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的舒適；第三，是中國的宮室園林，比外國的雅麗。張奚若先生也提出三點，第一，是宮殿式的建築，第二是寫意的山水畫，第三是中國飯。張奚若先生的第一點與第三點與梁實秋先生的第一點與第三點是相同的。其實梁實秋兩位先生所提出的中國文化的優點，是否比西洋爲優，也大有討論的必要。就使我們對於這點，不加以討論，我們也得明白，文化的各方面或成分，是千緒萬端，把梁張兩位先生所提出的各點總合起來，也過四點，那裏把中西的文化比較起來，我們的文化，固形見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其實，梁實秋與張奚若兩先生，還能舉出幾點得數項優點，以資討論，張申府先生除了空談洞洞的說了長短之外，並沒有具體的指出中國文化，在那一方面或幾方面，是我們的特別優點，值得我們去保存。

我們並不否認我們的文化有許多方面，會有過去榮耀的歷史。指南針，火藥，印刷術，曾爲西洋人所贊美與採用，然而這是歷史的陳迹。這些東西，經過西洋人改進之後，無一不比我們爲優，這又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事實。

### 三

共殊的區別——馮友蘭先生是以共殊的區別，去批評全盤西化論。他在新動向雜誌上發表了上篇「新事論」，名爲「新事論」。第一篇是別共殊。馮先生的意見，文化可以分爲共同與特殊兩方面。所謂共同的文化，或馮先生所謂類型的文化，是人類共需的文化。所謂特殊的文化，就是每個民族特有的文化。前者可以改變，而後者却不能改變。大致上，這種區別「差不多

在三十年前韋伯 A. Weber 在其社會學的文化觀念 *Der Soziologische Kulturbegriff* 一文裏，已經解釋。後來馬其維 R. M. MacIver 在其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書又加以說明。照韋伯與馬其維的意見，我們可以區別文明與文化。文明是人類努力去設法以統制其生活的狀況的一切機構與組用。文化是人類努力去滿足自己的內在的結果。實言之，文明是利用的東西，文化是目的。文明是常變的，文化是少變的。文明是工具。文化是目的，是價值，是時款，是情緒的結合，是智力的努力。打字機，印書館，工廠，電話，銀行等等，都是文明。小說，圖書，詩歌，哲學，劇曲，教條等等，都是文化。因爲文明是利用的東西，所以文明可以從一個地方傳到別的地方，而不失其原有的意義與形式。文化是一種自足的範圍 *Eine Geschlossene Welt* 而與民族精神不能分離，所以不易傳播。

事實上所謂共需與特殊的文化，就有了密切的關係，而難於分開。所以韋伯與馬其維雖把文明與文化或說利用的文明或自足的文化分開，然他們而特別馬其維，却承認兩者都有密切的關係，而不易分開。馬其維對於這點，很能了解。他自己就指出，比方，一件衣裳與衣以禦寒而來看，固是一種利用文化，但從其時款方面來看，又是自足的文化。同樣的文化，既有自足與利用的關係，所謂共需的文化，與特殊的文化，也難於區別。

馮友蘭先生所謂共同的文化，或類型的文化，與特殊的文化區別，大致上是近於韋伯與馬其維所謂利用的文化與自足的文化區別。他承認，從共需的文化來看，中國必需全部改變，就是全盤西化，所以他說：

照此方向以改變我們的文化，則此改變是全盤的，因爲照此方向以改變我們的文化，即是將我們的文化自一類轉入別類，就此一類說，此改變是完全的，徹底的，所以亦是全盤的。

但是馮先生又說：

此改變又是部分的，因爲照此方向以改變我們的文化，我們只是將我們的文化自一類轉入別類，並不是將我們的一個特殊文化改變爲別一個特殊。我們的文化之與此類有關諸性，則不當改變，不必改變，所以自中國文化的特殊的文化說，此改變是部分的，此改變又是中國本位的。

馮友蘭先生可以說是主張全盤西化者，同時又是主張本位文化者。實言之，從共需的文化方面來看，他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從特殊的文化方面來看，

他是主張部分西化，就本位文化的。

我們上面已經指出，所謂共需的文化與特殊的文化是有着密切的關係而不易分開的。馮先生自己也告訴我們，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是不通的。同時他又指出以中國的精神文化與西方的物質文化來融合的見解，是謬誤的。馮先生所說的共需，究竟是不是近於體和用或精神和物質的區別，馮先生自己沒有明白的說出來，不過若從他同情於中國本位的文化的方面來看，那麼他是近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辦法。又章柏與馬其維的利用的文化，是偏於物質的文化，自足的文化，是偏於精神的文化。馮先生的共需既近於利用與自足的區別，那麼他一方面主張共需的區別，一方面又有意或無意對共需的區別，這是一個矛盾了。

假使他以爲他的共需的區別，是與體與用或精神與物質的區別，有了根本不同之處，那麼他所謂共同的文化，究竟是什麼，所謂特殊的文化，究竟又是什麼，在他的著作裏，他並沒有明顯的列舉出來。他既不擴張之洞一樣的把中國的四書、五經、史事、政書等等當作體，把西洋的學校、武備、算、繪、鑄、醫、聲、光、化、電當作用；他又不像章柏與馬其維一樣的，把利用的文化與自足的文化分別加以列舉，這麼一來，所謂共需的別，只是一種空談，只是一種名詞上區別而已。

然而馮先生在贊中學一書裏，又好像以爲道德是中國文化的特殊文化，所以他說：

清末人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就一方面說，是很不通的，但是就一方面說，亦是可以說得的。……如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是說組織社會的道德，是中國人所本有的，現在所須添加者是西洋的智識、技術、工業，則此話是可以說得的。我們新事論的意思，亦正在此。

總而言之，新事論的旨趣，是要指出自清末至今中國所缺的是西洋的智識、技術、工業，所有的是社會組織的道德，這種主張不只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說法，而且是保存中國的精神文化，採取西洋的物質文化的變象。因爲清朝末年一般人所說的中學爲體，主要既是指着中國固有的道德，民國初年一般人所要保存的中國的精神文化，主要也是指着中國固有的道德。馮先生自己一方面很明白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很明白的主張保存中國的精神文化，採納西洋的物質文化，別方面又很堅決的反對這些主張，這又不能不

說是一個矛盾。

其實道德之於智識技術工業是有着密切的關係的，智識發展，技術進步，工業發達，則社會組織的本身也要起了變化，所謂組織社會的道德，也不能不受了影響。我們知道家庭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家庭道德是中國組織社會的道德的基礎，自西洋的智識技術工業輸入中國之後，中國家庭的組織，固正在變化中，中國家庭的道德，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男尊女卑，夫死婦殉；以及其與家庭有關的各種信條禮俗，無一不受了重大的影響。所以採納了西化的智識技術工業，則我們在無意或無意之中不得不採納了西洋的道德。反過來說，中國今日對於西洋的智識、技術、工業，所以不能夠全盤採納，徹底講求，也是由於固有道德作祟。「學而優則仕」，所以求智識的目的是做官，作官是揚父母，益宗族。君子講道不講器，所以對於技術工業都不願講求。因此之故要想提倡西化的智識技術工業，非推翻這些道德，是沒有用的。

馮先生好像以爲道德是不變的，所以他說：

在基本道德一方面，是無所謂近代化，或不現代化的。有些人常把某種社會制度與基本道德爲一談，這是很不對的。社會制度是可變的，而基本道德就是不可變的。

然而同時他又說：

忠孝可以說是舊道德，我們現在雖亦仍說忠孝，如現在常有人說我們對於國家盡忠，對於民族盡孝。不過此所說忠孝與舊時所謂忠孝意義不同。此所謂忠孝，是新道德。

一方面說道德沒有新舊，這又不是自相矛盾嗎？我並非沒有注意到馮先生所謂基本道德的「基本」兩字。這就是說，以前人講忠孝，現在人也講忠孝，所以在基本上仍然存在。不過這裏所謂「基本」最多也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名詞。比方以前人有舟車，舟車的名詞固然存在，然而舟車的意義，已不大相同。這正像忠孝的名詞固然存在，忠孝的意義，已大不相同。意義的變化，纔是真正的變化，我們要現代的「忠國家」「孝民族」的道德，正像我們要現代的火輪船，摩托車一樣呵！

馮先生好像以爲中國人之所以爲中國人，必定有其特殊之處，而這種特殊的地方，就是中國人的文化。其實文化是變化的，衣蔽前而不蔽後的，固是中國人的文化。戴冠帶與穿衣裳的也是中國人。磨馬褂與穿胡服的，既不

失其爲中國人，難道戴洋帽穿洋服，就不是中國人嗎？信了孔孟，信了佛的，固是中國人，信了耶穌的，難道就不是中國人嗎？我們可以從衣樹葉而變爲穿衣服，我們也可以從衣胡服而穿西裝，我們可從信孔孟而信佛回，我們也可以從信佛回而信耶穌，文化是人類的創造品，我們要作文化的主人，不要作文化的奴隸。

我翻閱馮先生的「新事論」，覺得有許多處如辦城鄉，明層次各篇，是有意或無意的主張全盤西化論，然而有些地方，如別共殊，贊中華，又有有意或無意的趨於折衷辦法與本位文化。這其實就是犯了矛盾的病，未知馮先生以爲如何？

#### 四

體用的關係——賀麟先生是用體用的關係，去估量全盤西化論。把體用的觀念去調和中西文化的主張，雖是甲午戰敗以後的事，但是體用的觀念，是與道器的觀念，有了密切的關係。

薛福成與李鴻章在七十年前已提倡以西洋的器的文化，來調和中國的文化。張之洞與劉坤一一般人，是不受了薛福成與李鴻章的影響，不得而知，但是兩者都是中西文化的折衷派。這還是中國的道器的文化，或體的文化，是可以與西洋的器用文化，用的文化相混合的。

賀麟先生是極力反對這種體用分開的辦法。他是從哲學上的觀點，去說明體用合一。所以他說：

根據文化上體用合一的原則，便顯見得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法之不可通，因中學西學，各有其體用，各自有其體用，不可生吞活剝，割裂零售，且因體用不可分割，西學之體在中國來，決不會變成用，中學之用，亦決不能變成西學之體。而且即在精神文明爲體，物質文明爲用的前提下，成道學爲體器學爲用的前提下，中體西用之說，亦講不通。蓋中學並非純道學，純精神文化，西學亦非純器學純物質文明。西洋的科學或器學，自有西洋的形而上學或道學以爲之體，西洋之物質文明亦自有西洋之精神文明以爲之體，而中國之舊道德、舊思想、舊哲學，決不能爲西洋近代科學及物質文明之體，亦不能以近代科學及物質文明爲用。當中有獨立自得新科學時，亦自有獨立自得新哲學以爲之體，中國的新物質文明須中國人去自力建設創造；而作這種新物質文明之體

的新精神文明，亦須中國人自力去建設創造，這叫做以體充實體，以用充實體，以用補助用，使體用合一發展，使體用平衡並進。除此以外，似沒有別的捷路可走。此外以新酒舊瓶舊酒新瓶之喻，來談調和中西文化的說法，亦是不甚切當。最易滋誤會的比喻，因爲各部門的文化，都是一有機體一體，有如土壤氣候之於植物，密切相聯，決不似酒與酒瓶那樣機械。湊合。

賀麟先生又說：

研究介紹採取任何部門的西洋文化，須得其體用之全。見其集大成之處。必定對於一部門文化，能見其全體，能得其整體，才算得對那種文化有深刻切實的了解。此實針對中國人研究西洋學問的根本缺點而發。因爲過去國人之研究西洋學術，總是偏於求用而不求體，注重表面而忽視本質。只知習情形下事物，而不知寄意於形上的理則，或則只知分而不知全，提倡此便反對彼，老是狹隘自封，而不能體用兼該，使各部門的文化，皆各得其分，並進發展。假使以這種偏狹的實用的態度去研究科學，便難逃不陷於下列兩個缺點：一因治科學缺乏哲學的見解，在哲學的範圍，前人的教養欠厚，支離取屑，而乏創造的勇氣，賀麟的系統——西洋科學家所承的這種價值之遺留，多不如此。這對於體的精神之把握，修養，認清文化科學的目的，而在於見道知天，非徒以有用而用之技術見長，此種科學探求的境界，自非求用而不求體者所可及。

我特地把這段話抄下來，不但因爲賀麟先生是一位認識西洋文化較深的人，而且因爲他這種理論，是十餘年來主張全盤西化的人的一種基本的理論，一種有力的理論。然而。

賀麟先生却又告訴我們道：

我所謂西學，須先見其體用之全，須得其整套，但這並不是主張全盤西化，因爲說須對於所研究的那部門的學術，文藝，得其體用之全，或得其整套，不唯不致被動的受西化影響，奴隸式模仿，而且可以自覺的吸收，採取，融化，批評，創造，這樣既算不得西化，更不能說是全盤西化。

我要指出：主張全盤西化的人，並不主張被動的西化，奴隸式模仿，而是主張自覺的吸收，採用，融化，批評，與創造的精神。西洋文化本身之所



以能有劇烈的進步，也就是有了這些精神，中國文化本身之所以落後，就是缺乏了這些精神。其實主張這些精神的人，已是有了西化的精神。

賀麟先生又說：

我承認中國一切學術文化工作，都應該科學化，受科學的洗禮，但全盤科學化，不得謂為全盤西化，一則科學乃人類的公產，二則科學是西洋文化之一部分。

我們承認科學乃人類的公產，然而我們不能否認近代的科學是西洋的特產。所以科學化不能不謂為西化。我們並不否認科學在中國的前途是很光明的，我們也不能否認我們的西化的科學，還很落後，所以科學的提倡，雖有七十年的歷史，科學的介紹，雖有三百年的歷史，然而直到現在我們還要派留學生到西洋學科。明明是到西洋學科，明明是受西化的教育，却又否認是西化。這是國人的誇大狂。正像陸象山之徒，明明受了佛教的影響，却口口聲聲說這是「我儒之道」。正像一般留學生，自小至大就進西化的學校，出了九虎一牛之力，希望一到西洋，然而回國以後，却大吹其復古的法螺，對於中國的間有的生活，既並不見願意享受，反而阻礙科學的發達，西化的發展。今日一般之住洋樓，乘汽車，而說周孔之道，甚至享姨太太之權者，都是這種誇大狂作祟。

我們承認科學是西洋文化的一部分，然而要西洋的科學，也得要西洋的哲學，因為在西洋的文化裏，這兩種東西是有了密切的關係。這一點賀麟先生自己就很明白。他不但用亞里士多德的相對的一體用一概念去說明哲學為科學之體，科學為哲學之用，而且以為西洋的科學家，每承中古修道院僧侶之遺風。我所以說賀麟先生對於西洋文化，認識較深，就是這個原故。西洋的科學，既與西洋的哲學以至神學都有了密切的關係。那麼照賀麟先生理論所謂西洋科學之全，就是不要得西洋的科學之全，而且不要得西洋的哲學以至神學之全了。我已說過西洋的物質文化，是由西洋的科學產生出來。西洋的精神文化是由西洋的哲學，以至神學產生出來，物質精神兩方面，都要西化，這豈不是全盤西化嗎？孔德把西洋的文化分為神學時期，哲學時期，科學時期，若照賀麟先生的理論恐怕所謂效法西洋不只要效法現代的西洋，而且要效法十七十八世紀以至中世紀的西洋了。

總而言之，若照賀麟先生的前舉來看，他是偏於全盤西化的主張的。可

是他的結論，却是中西合璧的辦法。結論與前提相背而趨，就是一種矛盾。不但這樣，他一方面很明白的指出中學西學各自成一整套，各自有其體用，不可生吞活剝，割裂零售，一方面又反對中西文化異同論，反對全盤西化論，這又不能不說是一種矛盾。此外賀麟先生一方面以為假如全盤西化後文化中國會淪為異族文化之奴隸，而一方面又以為「文化乃人類的公產，為人人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不能以狹義的國家作本位」。這又是一種矛盾。

##### 五

上面是把在抗戰時期與幾位批評全盤西化的代表人物的言論簡單的加以批評，同時說明我們的立場。我個人以為他們最大的缺點，是一方面既忽視了中國西化的事實，一方面又沒提出一個具體的辦法，我說他們忽視了中國西化的事實，這就是說，有了許多西洋的東西，如基督教之類，雖有許多主張不要採納，然而事實上三百年來，而尤其是一百年來，國人雖不斷的加劇烈的反抗基督教，然而基督教却繼續的傳入，繼續的發展。反對全盤西化的人，好像以為基督教完全尚未輪進來，所以主張我們可以不要基督教，而要別的東西，如科學之類。他們不但忘記了消滅基督教，是一件不易做到的事，而且忘記了，中國的科學，直到二十年前，主要的還是由教士的傳入。主張全盤西化的人，未必是贊成或鼓吹基督教的人，但是他們看得基督教已經傳入，而且他們相信信教是自由的，所以他們以為與其反對人家信仰基督教，不如勸信基督教的人，誠意的去做基督教徒，澈底的去宣傳教理。

我說反對全盤西化的人，並不提出一個具體的辦法，這就是說，他們既不主張全盤西化，他們又不主張復古，他們應該是折衷派，然而西洋有什麼東西是值得我們採納的，中國有了什麼東西是值得我們保存的，他們從沒有詳細的列舉出來。單只籠統統的說了取長去短，這是空談而沒有用的。結果不但沒有益處，反而為了一般所謂中西文化之短的人們張目，以為這是折衷，這是中西合璧。帶姨太太去作無意義的跳舞的人們，就是一個例子罷。我們回想十餘年前，我們開始提倡全盤西化的時候，好多人都以為這是不經之談，這是惰怠作用。可是經過民國的廣州學術界與民國廿四年全國人士，作過熱烈的討論之後，不但護駕全盤西化的主張的人們，逐漸趨於絕跡，而且贊成全盤西化的主張的人們，越來越多。現在一般所謂頭腦較為冷靜的學哲學的人們，又從哲學的觀點去估量這種主張，這不只是表示國人對於



西洋的文化作進一步的認識，而且對於全盤西化的主張作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回想在上一次歐戰的時候，不但有了許多名流沒有條件的歌頌中國精神文化的超越，很不客氣的指摘西洋精神文化的缺點，而且有了不少人士，以為西洋的物質文化，也是一種文化的病態，不久就要趨於崩潰。所以辜鴻銘要重開「孔家店」，梁啟超也大叫「向東轉」。然而在這次抗戰與歐戰的時期裏，反對西洋物質文化的人們，固已絕跡，指摘西洋精神文化的人們，也已寥寥無幾。這又不只是表示國人對於西洋文化作進一步的認識，而且是對於全盤西化的主張作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回想八十年來，一般的國人，若非偏於復古，就是偏道器體用與精神物質的調和論調。到了近來，許多的國人，不但反對復古，而且反對任何折衷。張馮賀三位先生的言論，固是這樣，頭腦稍為清楚的人士也是這樣。

## 談所謂「文化膏藥」問題

讀了本刊第四卷第三期許情仲教授的「談文化膏藥」，很有點興奮。這是一篇很有意義的文章，我想趁病興頭，作一番淺薄的共鳴和補充。

把因病異藥，一病一藥作標準，膏藥的特點在其對於同種類型的疾病之普遍妥當性。然而有效的範圍愈廣，効力的程度便愈小；這是普遍性自身所規定了的。假使一百効膏一並不能治療各種各樣的病，而只能治療某種類型的病。那末本質上也只是對於特定類型的疾病保有相對的妥當性，並不是無條件普遍妥當的。所謂「百効」只是指示地對於同種類型的各病都有効。

西洋近代科學最初並不是膏藥。後來因為發現地可以治療同種類型的疾病，才變為膏藥。西洋近代科學原來是治療西洋「中世」這一病的一藥。西洋的「中世病」是衰老症，也是貧血症。西洋近代科學是返老還童術，也是補血劑。這不僅是對症而藥，並且是臨床後特別處方。所以不是膏藥。不過，西洋的「中世病」是一種歷史病，也是社會歷史到了一定的情形下必然發生的毛病。正因為這個緣故，凡是有社會歷史的地方，或早或遲也必然會發生這種病；為的是社會歷史的發展法則是有抽象的同一性的。儘管病的症狀具體不同，病的類型却總有着抽象的同一性。又因為這個緣故，西洋近代科學一面是專治西洋「中世病」的對症藥，同時其中又包含着治療同種類型

我們承認在表面上，像張馮賀三位先生的言論，是異於全盤西化的主張，然而他們在消極方面，既極力反對復古運動，又極力反對折衷辦法，雖則在積極方面，他們沒有給我們一個具體的辦法，標出一個顯明的態度，然而他們既指出復古的道路是不通，折衷的辦法又不行，那麼他們的言論，至少在消極方面，是近於全盤西化的主張。而事實上，他們，而特別是馮賀兩先生，於有意或無意之中，已說出全盤西化的理由，已偏於全盤西化的主張。這又不只是表示國人對於西洋文化作進一步的認識，而且是對於全盤西化的主張作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的結論是，在抗戰時期，事實上我們固趨於全盤西化，態度上，我們也是趨於全盤西化。

蔡樞衡

的病之同種類型的藥之抽象的同一性。既發現了病之抽象的同一性，又知道了藥之抽象的同一性，於是西洋近代科學在理論上被當作膏藥了；事實上只也保有着膏藥所可有的效能。

把這種膏藥來治中國的「病」。會不會有効？程度又怎樣？解答這問題，需要追問中國的「疾」是不是歷史「病」？和西洋的「中世病」有沒有抽象的同一性？我的答覆是：中國的「病」是「歷史的」。中國歷史病在於經濟上的一「農業」，政治上的「專制」，社會關係上的一「家族本位」。西洋近代科學這劑藥定性分析的報告是：牠的主要成分是一「工業」，「民主」，「個人本位」，和一「自由」。從這點看，洋膏藥——西洋近代科學對於中國的歷史病是對症而藥的。至於効力的程度固然是把「一般性」作限界的，但適當地投藥和改造原藥，可以增進藥的效能，也是毫無疑問的。從這點看，販運洋膏藥的留學政策原則上沒有錯；洋膏藥業者的罪過也不在販運洋膏藥。

不過，中國近百年來的病是二重的：一面是「歷史病」；同時還有一社會病」。中國的社會病是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不平等。換句話說，中國一向被別人當作了姨太太。鬼子或娼妓。大家肆意發揮野性，任情蹂躪。若說中

這種社會病至今沒有治療，便是膏藥業者的無能。這話是可以說的；也是不可說的。因為西洋的膏藥原來是在沒「社會病」，只有「歷史病」的前提下調劑的；假使也有社會病，我們相信必定會「加味」。這點似乎留學政策根本沒有考慮到；膏藥業者也多半沒有留心到。所以要責備是無能，似乎是百感莫辭的。然而假使把西洋近代科學的重心當作膏藥的範圍。「社會病」的對症藥簡直不在本來意義的膏藥範圍內。沒有留心到，毋寧是當然的。並且假使「加」了「味」，結果是固有意義的。洋膏藥變了質。留學政策和洋膏藥業者自始即無心販運這種變質的膏藥。從這點說，要責備是無能，不免有點語不中肯，文不對題的感想。

近百年來中國的「歷史病」和「社會病」是有機地結合了的。自縱的觀點看是歷史病；自橫的觀點看是社會病；歷史病和社會病是一體的二面。專重社會病的治療，拋棄歷史病不管，固然根本治不好。假定治好了，也會外強中乾，虛弱得利害。專治歷史病，拋棄社會病不管，不僅治不好，並且死得快。因為治歷史病的藥是補藥，也是興奮劑。在被蹂躪的過程中，興奮劑的效用是使元氣加倍消耗，自然死得快。必須治歷史病的藥和治社會病的藥雙管齊下，互相顧盼，然後可以靈驗。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在這種企圖配合的處方之典型。從這點說，留學政策的意義是有限度的；根本上只能當作合目的的手段之一部份看待。同樣，膏藥業者的業務也是有益的；不過不是處方的全部，必須和固有意義的膏藥業者所沒有的東西相配合。換句話說，也只是處方的一部份，不是整個的處方。膏藥業者把自己當作整個的處方，或者對於膏藥業者求全責備；同一是不符合實際和理論的誇大或苛求。

自另一點看：西洋的中世病是「西洋的」和「中世的」，洋膏藥！「近代的西洋科學也是「西洋的」和「近代的」。這具體的「西洋的」和「近代的」一面是具體的「西洋的」和「中世的」之具體的克服者，同時是西洋膏藥的全世界、換句話說，因為洋膏藥有時間性和空間性，並且因為膏藥的研究工作非常發達，結果使一個膏藥的全體被分割為無數的認識單位，各個單位間固有的有機聯繫完全被切斷了，剩下來的一個膏藥的部分品，不見了收藥全體的變形。整個膏藥之歷史的意義也不容易看出來。這樣，每一膏藥業者所販來的，充其量常常只是治療痼疾的特定膏藥整體中的幾分，幾十分或幾百分之一。這若干分之一是被全體化了普遍化了的；結果不容易

還原復為全體中的若干分之一。假使全體的各部分品幸而化合起來，結合起來了，這個整體又是被絕對化永久化了的整體；很不容易還原為歷史的一階段。無論如何，這種情形，易使每一膏藥業者陷於無知，決定了每一膏藥業者無能。缺點的補救，至少需要所有的膏藥業者意識地分工合作，並且需要超越於膏藥業者之上的人作適當的運用和調度。從這點說，膏藥業者是不是應該責備？是把有沒有適當的調度？是不是服從了調度？和每一膏藥業者是否已經明白了自己與知能之界限性？等等作前提的。

這是不容諱言的：一般說來，洋膏藥業者並沒有完成膏藥業者應負的使命。因為膏藥業者中似乎並沒有多少人真把洋膏藥的整體或若干分之一的部分品販運回來了。從這點說，不是留學政策要不得，而是留學政策並沒有達到預應的目的。有些富翁或遊歷家拿來炫耀世人的並不是膏藥或藥的部分品，只是販膏藥之名，行遊歷之實的過程中的見聞談，印象記，甚或享樂的回憶錄。這是沒有膏藥味道的「富翁」或「遊歷家」的神情；富翁或遊歷家的神情和販洋膏藥，本質上沒有內的關聯。「富翁」或遊歷家和「膏藥業者」完全是二種不同的資格。富翁或遊歷家的本錢是「金錢」；膏藥業者主要的本錢應該是「聰明睿智」。不過，富翁和遊歷家的存在的確是自由主義的放任的留學政策之副產物。從這點說：派人留學是對的，可是放任起來便會發生靈虎類犬的毛病。

在客觀的見地，富翁和遊歷家只能把他當作富翁和遊歷家看；對於膏藥業者本身的責難，只能限於業者的「業務」範圍內。在這種前提下，對於富翁和遊歷家的責難另是一回事；對於膏藥業者有意義的批評，只能舉出：膏藥全體和部分的素質，分量，效能，應用，製造方法等等的販運不完全和不徹底。不過，同時也不可忘記：這種毛病不少膏藥業者已經自覺了。近年，自己研究，把自己作對象來研究的新傾向，都是這種自覺的表現。

舉目一看膏藥世界的全貌，很易肯定這是顯明的事實：我們雖然隨時隨地可以發現很可寶貴的民族自我覺醒的因素，可是普遍現象還是充滿了「自我無上」和唯「洋」主義間的錯綜對立，也就是洋膏藥和土膏藥，洋膏藥業者與土膏藥業者間的尖銳矛盾。

這也是不容否認的：「自我無上」不能在唯「洋」主義之前抬頭；土膏藥不能和土膏藥並駕齊驅；土膏藥業者見着洋膏藥業者會「自慚形穢」；民

族自我覺醒的因素却介於二者之間，幾乎不容易維持牠的存在和地位。換句話說，唯「洋」主義壓倒了「自我無上」；洋膏藥吞了土膏藥；洋膏藥業者克服了土膏藥業者；民族自我覺醒的因素却在二者鬥爭的火花中萌芽生長，並且在二者夾攻的局勢中討生活。

還有一點也是活現的：唯「洋」主義對於「自我無上」是以力服，不是以德服；土膏藥業者對於洋膏藥業者是形服，不是心服；土膏藥敗於洋膏藥完全是品質勝不過洋膏藥，不是由於效能或銷路。民族自我覺醒的因素是在「洋」和「自我」二者中吸取積極的成分作榮養，培植成功新的自我；在洋膏藥和土膏藥二者中吸取有效的成分，煉成對症的藥方，捨土膏藥業者之短，取洋膏藥業者之長，獨樹一幟，創造一種非百效的因症異方，一病一藥的作風。

假使把上述三點內容間的關係綜合並抽象一下，我們的認識是：整個文化現象一面是矛盾的克服；同時是不統一的矛盾對立；此外另有負有統一矛盾

## 工業與交通

新式工業制度的發展，有賴於交通條件的具體原質。一般人所理解。可是在以往這兩件事實沒有受到同等的注意，兩者之發展未得相輔而行之效果。因為工業大部分是私人企業，而鐵路則為政府職分以內之事，私人企業要求在過去很少成為政府政策的骨幹的機構，政府的精力多半注重於軍事政治之急務上，以是在理論上雖有人論及交通與工業商業之關係，在事實上做到的很有限。自抗戰開始以來，經過三年多的持久戰爭，西北西南兩地抗戰的根據地，在重慶重鎮上我們要建立新式工業的基礎，本於實際的急需，由於愛國心的發揚，公私奮發，期於有成，各方面深切的感覺到交通條件的解決是今日工業發展的第一個當前問題，不能在交通問題上得到相當的解決，工業問題很難談起。我們過去在西南方面交通設備約工夫不夠，到了今天我們這當從頭兒做起，付較大的代價。

無論在戰時，還是在平時，工商業的發展與交通都是息息相關。只有在進步的交通狀態之下，新式工商業才有發展的可能。我們把當代經濟制度分析起來，有兩個基點：其一為高度的分工，其二為交換範圍的擴大。因分工而

盾的事物之萌芽。因為「自我無上」和唯「洋」主義，土膏藥和洋膏藥，土膏藥業者和洋膏藥業者，由本質上的對立到事實上的抗衡，最後是唯「洋」主義，洋膏藥和土膏藥業者打了得勝鼓，獲得了支配權。所以說是矛盾的克服。可是一方對於他方是力服不是心服，是形服不是心服，是敗於品質而不是敗於銷路；換句話說，優勝者並沒有攝取劣敗者內在的積極成分，劣敗者雖然喪失了「無上」性，却仍維持着相對的獨立性。這獨立性便是表示不統一的矛盾對立。然而民族自我覺醒的因素是氣吞唯「洋」和「自我無上」，而從這中間產生出新的自我。這顯然不是單純的唯「洋」，也不是單純的「自我無上」，而「洋」和「自我」却都在懷抱之中。這懷抱「洋」和「自我」的民族自我覺醒之因素便是「洋」和「自我」間矛盾的統一之主體。這主體現在雖還在萌芽，——至少是還沒有長成，可是明日中國文化天下的真明主，客觀上似乎非這位儲君莫屬。

張德昌

交換成爲必需，由於交換的愈趨合作之妙，分工不祇是技術上的分工，區域上的分工亦同等重要。無論自那一點來說，都有進步的交通爲先決條件。因此就工業生產與交通而言，兩者固互爲因果，沒有進步的工業生產，不談產生現代的交通工具；但是自經濟演進的階段來說，交通的進步可謂工業一般進步爲可能。交通的進步推動了工業生產的發展。因此有許多人以交通的發達來劃分經濟進步的階段。十九世紀有了新式交通方法之後，便進入了另一個新的時代。鐵路時期是一個時代劃分期。所謂鐵路時代就是近代工業發展時期。新式交通的首先發達於英國，使英國工業成爲世界的工廠。近代德國交通網的樹立，奠定了工業化德國的基礎。俄國在十九世紀始有新式工業的基礎，也因為交通條件未能具備之故。

交通與工業之密切相關，在重工業方面尤易看出。交通之所以能促進工業的發展，不祇是因為新式交通方法的運輸能力大，速度超越舊式交通工具，還因爲在時間上有準確性，在運輸成本上節省得多，有了新式交通方法，工商業家可以依照一個時間來作事，可以預計程期，可以據以計算一切。可

以計算的交通方法是新式工商業所需要的一種要素。工業家可以感觸到市場的需求，可以決定生產量，以之計算事業的得失盈虧，這對於工業家是很重要的。在通常情形之下，進步的交通代表的是運輸成本最低的方法。只有在運輸成本輕微的交通狀況下，新式工業才能興發發展。

在過去中國近代經濟史上，稍大一點的工業也都與交通便利的條件息息相關。舊式山西省的冶鐵及鐵器製造在靠河南的衛輝彰德的河運之便而輪於冀魯一帶。糖，漆器，布工業都在靠浙江的寧紹和江蘇等省。政府的織造局所也在水運便捷之處。我們可以說，即在清代手工業階段的工業，只有在交通便利之地才有較大規模的組織，中國工業之局促於東南沿海沿江各省，受交通條件的支配，早已如斯。近代由清末至抗戰前，中國民族工業的基礎亦有建立，方在萌芽的一點新式工業基礎在地域上又畸形分佈於東南沿海省分。此其故並非全由於中國工業家之缺乏眼光，實在交通形勢使然。只有東南沿海地帶具備了新式工業發展的條件，至於內地省分的交通狀況則使新式工業無法立足，過去畸形交通的條件已決定了抗戰前中國工業在地理上分佈之狀況，我們不能專責備前人之失策。第一中國在清季工業技術處於手工業時代，新式交通的發展，學之外洋，所以自沿海修築起，第二，清季政府計以困難，幾條鐵路幹線的修築大半借自外資資本，在外國資本控制之下，沿海港口成爲外國工商業的吞吐港，鐵路變成了洋貨由沿海口岸向內地推銷的輔助線。有新式交通的地帶都是洋貨可到達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工業無法建設起來。第三當時社會對於新興事業的阻力很大，愈深入內地愈難舉辦新興事業。所謂社會的阻力不單是迷信風水的平民，一般假借時務的頑固官紳尤爲可畏。光緒十五年政府擬修津浦鐵路，有一般政府官吏引經據典力請停修，他們的理由是當地人民反對。修路後將有不少人失業，外國兵可易於登陸，外國人可入內地傳教，更提出即在西洋法國欲修鐵路以通俄國，爲俄所停而停修，以爲本國不可修路之理由，當時有少數大臣能據實指出這些反對者之荒謬，但社會上的阻力竟使他們不敢忽視。雖然譚李諸人能明白鐵路與振興本國工商業的關係，可是把軍事理由放在第一位。在當時只有軍事理由可以壓倒反對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實現了近代中國地圖上幾條幹線。因爲有以上諸種原因，所以這幾條路線對於中國民族工業基礎的積

創，沒有貢獻。由清季至抗戰前，雖略有興建，然交通已定之輪廓未變。在經濟上中國分裂爲兩個地域：一是外國資本勢力支配下的地域，一是沒有鐵道線的舊經濟制度區域。中國新式工業在這種地域不能興起。民國以來雖曾有人倡言交通建設之重要，但是舊有的交通形勢未變。因爲民國以來十年中由於政局的不安定，不是修路，而是毀路。僅有的幾條路線不會達到政治統一的目的，却變成了軍閥爭奪的工具，有鐵路的地方成了內戰最多的地方，新式交通反成了工業發展之害。

隨着時代的進步，公路成爲與鐵路同等重要的運輸線。國民政府自始迄今，均以發展交通爲主要任務之一，政府的交通部，鐵道部，國防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前身）以及私人團體共同努力的結果，使中國在戰前有了九千五百公里的鐵路，十一萬公里約公路，五萬三千公里的電話線，九千五百公里的電報線，一萬四千公里的航空路線，五十八萬公里的郵政里程，中國在表面上已有走入工業化途徑的可能。然而平心靜氣的來看，這種發展的情形不足以應當前民族工業發展之急需。第一，近年來以公路的修築爲最有成績，就已有之公路分佈看來，去經濟的意義尚遠。公路之爲用須與鐵道相配合，公路本身須路線枝幹四佈暢達成爲公路網，始能與經濟脈絡相呼相應。近年來所築的幾條幹線，既無鐵路運輸之主幹，又無自造器材，運輸成本過昂。有軍事政治的價值，沒有多少經濟的價值。在不計成本以赴事機的情形下，在抗戰前軍車可以由首都直駛西南高級官吏的觀光團可計程而達，但很少商家能利用公路作運輸的途徑。很少商品能擔得起運輸的成本。東南省份通幹線的公路已開通了，商品的運輸仍以沿海沿河的運輸線爲主。所以單單的公路交通不能促進工業的發展。第二抗戰前數年中起了幾條鐵路，十年內修了十一萬多公里公路，其動機及目的多爲軍事及政治。固然有軍事政治價值的公路也可以有經濟價值，然而照戰前那種修路的速度仍嫌不夠。專就成績卓越的公路而言，平均我們每年造了一萬餘里的路。若照這樣速度下去，須九十年如此不斷的做，我們才能趕上面積只有我們四十分之一的英國道路里數。第三，交通的分佈不平均，不合經濟需要。在過去是如此，在現在仍未校正。單用數字來比較不能得事實之真象：英國平均每二千二百人有一英里鐵路，德國每一千七百二十二人有一英里鐵路，中國平均每五萬餘人可有一英里鐵路，相差懸遠，但事實上真況並不如是。有幾省地方連一

尺鐵路都沒有。四川在現代中國經濟上地位之重要，於今益形證明。其一省人口幾與德國相埒，但四川是無鐵路的省份。若果沒有大江的自然運輸動脈，四川在經濟上之處於隔離狀態是無疑問的。就是在鐵路線較多的省份，公路也不一定發達。有人說過新式交通對於中國一般經濟生活沒有發生影響。有其真實性。

過去的情形是如此，我們要講究民族工業的發展，自當在交通方面進一步的努力。今後中國工業之發展，必須以國內市場為目標。一個先進國家只有在領域以內培植市場，此在其他各國皆然。中國地大人多，國內市場之大對於工業發展來說是一個優特的條件。但是這個大的市場，必須用近代交通制度組織起來。我們必須儘先的辦到像孫中山先生那樣約十萬英里鐵道，一

## 法國最近的外交政策

法國人是愛國的。怎樣不會愛國？今日享有八十歲壽命之法國老翁，就親眼看見可愛之港土三次會被德國戰蹄所踐踏。戰爭之結果，勝也罷，敗也罷，法國人總不致付予最大之代價。法國之領土，好像是天註定當作戰場的。其以上次的歐戰，雖使法國人一躍而操歐洲之霸權，惟戰後底滿目荒涼，廢墟如墟，國家犧牲之大，亘古未有，使同情法國者，引起一勝利何價一之感慨，這一個國家，這個祇有團結、犧牲、盡忠方可禦侮圖強之國家怎樣不會在國民心中，造成愛國之熱忱。論者謂：「法國乃愛國之國家」，誠非虛語。在此愛國之熱忱，祇要外患感覺之輕緩，便油然而生。其時，內部之糾紛停止，政黨團結，素以主張分枝之政見途在 Union sacrée 之口號下統一起來。

這次歐戰，法國率甲兵而走，引起我們對法國民族靈魂是否存在之疑問，甚者目法國之戰敗為亡國，置其與印度、越南、朝鮮於等量齊觀。這是不明瞭歐洲權力之消長所致。其實，稱雄一時之德國，何嘗不在一九一八年一敗塗地，今日敗北之法國，何嘗未有過凡爾塞一頁之光明。德國以短短二十年之努力，遂能揚眉吐氣，報怨雪恥，可知民族之前途，不決於一勝一敗，而在跌下有無爬起之勇氣。

法國已跌下去了。但誰敢說，法國前途不光明。近日德法關係之微妙，

百萬英里公路的計劃，修築運河，開闢運河，沿河開港，聯絡成一國內市場，現在因為交通不備之故，西北蒙疆之附庸於俄國經濟範圍，西藏之連繫於印度，東南省分的製品須假道於越緬而達雲貴，像這種的分離割裂情形必須除去，而後才真能有大的國內市場之出現。新式工業制度的建立，須農村自給自足的基礎進而為市場生產的農業，然後可刺激農業生產，解脫人與土地的束縛，農業商業化，勞工能自由流動，在客觀環境上新式工業始能發展，這些都是要看交通的條件。在過去政府有過五年築路計畫，在自前更有速成的修繕辦法，我們不要以為我們進展的速度不慢，在認清了工業與交通關係以後，我們應當儘可能的首先完成我們的交通網，然後才能談工業的發展。

### 周信銘

德法數月談話折衝無成，維琪內閣之改組，法艦之雲集北非，法邊自動封鎖，都是法國求生之努力，絕不因戰敗而灰心喪志，陷民族於萬劫不復。

自法國慘敗後，維琪表面盡卑屈之態事，而此舉亦無不以復興為大前提。貝當執政伊始，首先改變政體，國會立刻在維琪開會，以三百八十五票對三票通過給予貝當以極權力量，賴伐爾遂制定新憲法，據此，國會議員，不復為民衆投票選舉，而是工團代表，一若法西斯制度然，上諸院議員則由政府指定。法國之法西斯化，一方面雖是應戰後社會之紊亂而生，亦國中保守商人金融資本家乘機用不流血之革命向工團作當頭之一擊之陰謀，惟根本之理由，却不在上二者。受極權國對佛朗哥之寬大之影響，維琪希望用主義底共鳴與德意接近，而獲得寬大之和約收獲，把作戰之責任，委諸民主的親英的政客上，使德意之忿怒，找得發洩之對象。戰後之維琪政府，遂得藉友誼之立場上與德意接近，貝當變政，理由在此。

其次，為獲得德意歡心起見，進一步起用賴伐爾。研究賴伐爾之政治立場，不能不稍涉及上大大戰後法國外交政策主張之分野。戰後之法國元勳，以 Clemenceau Poincaré 為代表，抱短見政策，杜絕德國復興之希望，使法國永無東顧之憂。故在始，則圖佔領萊茵右岸，得有沿萊因由北而南的德國重要工事——Cologne, Coblenz, Mainz, Darmsheln，使德國西境門戶



大開，失却抵禦之力量。及此要求未得英美支持後，又誘喬治·威爾遜簽訂軍事保證法國安全之公約。此議雖得威爾遜之同意，却惹美國國會之否決，保證法國安全之實行。自法國不克獲英美之保證後，遂轉而加強國聯之制，保法之武裝化，建起國際之警衛力量，作國聯行動之後盾。惟其時，英國時在保守派之包圍溫統治下，雅不欲放棄其傳統之孤立政策，復因法戰後在歐之領導地位而生猜忌，法國之國聯美夢，遂不能實現。法國之最後努力，乃與歐陸大小國家結為盟友，企圖包圍德國，使其永無復興之希望。

但德國不因其短見而束手待斃。德國之強大，已為不可遏止之趨勢，在時易境遷中，法國政界，產生著的外交主張，感覺德法兩國之無用，轉而施用恩德政策。這個轉變，當以戰後兩為時代之手印。自一九三四年戰後兩出任外相，法國外交顯出妥協之姿勢，直至其升任首相時，更進一步而主張放棄武裝聯盟之法國系統，而代之以對德作直接之合作。後因德國長得過大，法國之緩和政策，根本失敗，經此挫折，戰後兩遂換回恩德之政策，拉攏意大利。他給予意大利沙漠之一小塊，讓意以聯絡Adolf Hitler阿比西尼亞之首都，與布提港間之鐵路之股份與治權，使意把軍火沿路接運至海軍，促成阿比西尼亞之戰。其時，英國正欲促國聯對意裁制，後復調海軍開入地中海，而法竟為侵略者之幫兇，英國之孤掌難鳴，不得已而成立Duce, Laval協定，斷送這項僅存之沙漠黑國。戰後兩遂博得意人之好感，而他亦公開稱譽墨索利尼為一代之英雄。

在妥協政策不斷施行中，希特勒遂一舉而併奧吞捷，進兵波蘭，法國自知危機日深，隨報論者藉機攻擊政府，溫和派失勢，而大戰旋開，戰後兩之勢去，迫於息影辭職。

明白戰後兩之思想與政治背景，則知其當執政伊始，驟置戰後兩於重要地位，絕非無因。國際關係，非愛則恨，非和則戰，戰敗之法屬，悔當無益，祇有愛，雖然是表面的，方可冀換得較有利之和約。其當所以寄重托於戰後兩者，非其能也，特有所利用也。

去年九月初，戰後兩獲得全權代表資格，與希特勒正式談判。希氏對法之要求，雖無正式發表，然大約不出乎華盛頓外交界所傳出之數點，如加入軸心，割讓土地，要求法在非洲之殖民地之陸空軍協助下，攻埃及及近東諸管轄地，和再分配法之殖民地等，尤甚者，取得法艦

指揮權，經多次之會議，多次之折衝，德法接近，似到成熟階段，此點可從其當親自出馬會見希特勒一事見之。然而在談判進行中，法國忽持強硬態度。國際之形勢，國內之局面，可解釋這個變遷。

從國際形勢言之，德國已顯然無力進攻英倫三島，日後戰爭之重心，必在地中海無疑。獲得法國之合作無異控制地中海。何以故？法國之艦隊可供利用一也，法國之摩洛哥海岸和法國之地中海島嶼可為納粹根據地二也，法國一旦加入軸心，可使西班牙放棄其猶豫態度三也。若西加入軸心，則直布羅陀將不可守，納粹祇要渡過一哩寬之海峽遂能沿利於機械化前趨之沙漠公路，與意軍會師於里比亞。德意大戰，故曰：德國愈趨困難，對法屬復與愈有利。今日德國之苦悶，無疑對法增加不少勇氣。

其次，從內政言之，法國與論，已顯出強盛之力量，對維琪和平進行，予不少之牽制。法國人對維琪之反感，是可想像的，試觀其當在去年十月廿一日發表宣言稱：「法政府已決定與德合作，予個人對此事，負全部責任，人民一律應予遵守，否則政府一舉撲滅之一，」這可見法國人之情緒，對政府並不言從。對法國人之心理分析，所得之結論是：他們矛盾的，他們一方面同情政府處境之困難，對德遷就，乃輿論所默許，惟他方面，則誠恐政府過於軟弱，出賣民族萬世之壽命。對外交政策思想衝突若此，對內政亦持一種相反態度。愛好自由之法國人，在極端困難中，對獨裁政治，原得國人諒解，惟此制度，並不切合國人口味。自當政府之能站得住與否，全靠在此等矛盾中，找出中庸之道。法國人是不安於獨裁的，其歷史已證明法國人每一滴血是為自由流出的，其已往政潮之起伏，更深見政府之壽命，依輿論而存在。法國之民主政體，有悠遠之歷史，人民絕無日爾曼之機械化，理想是放任的，情緒是革命的，是則其偶一不慎，則政策非祇不能貫徹，而本身壽命，尚且不保。自當政府有見及此，一方面加強對德態度，以代表輿論，故自由法國說戰後兩之去職，乃證明法國輿論力量增強。對外政策如此，對內為緩和民衆情緒起見，其當創立一諮詢機關，羅致各黨各派名流學者，以備元首請其貢獻主張，收集思廣益之效，此乃自當政府公開政權初步之表示。及後，他組織中心內閣，以海長達爾朗任副總理，閣員則以外長佛蘭斯陸及洪特等補充之。由是觀之，最近之法國，已由絕對屈服與光榮和約，武夫政治與民主政體中，找出中庸之道，法對德態度之加強是此努力之表示。

關於戰後本人之遭遇，不能代表其當政策之向後轉，更不能目之爲德法關係破裂之明示。在今日德境之法國，兵臨城下，強硬外交，絕難談得到。就算維持外交，發生驚人變遷，賴伐爾雖不免撤職，而扣留查辦是絕對不合的。可知賴氏之會遭陷下囚，實有其理由所在，美國國際新聞社謂賴伐爾之去職，乃其會企圖在法組織純粹政府，此言或許可信。

法國之外交，歸因國內外之環境而加強其立場，可是強度是有限制的。論者有時不免過於重視法國艦隊，比之女人之美貌，以爲有此資產，則不難「轉爲浣沙女，暮作吳王姬」。不然，法國爲世界有數的軍國，艦隊直至今日亦堪稱完整，這是希特拉所願佔有的。因此，很多人說，有了艦隊，法國就可強硬海話。這並不一定，設德國不予法以讓步，法艦當可離開本土，德國其絕無辦法的。可是離開本土，向那條路走，投入英國懷抱嗎？這是不易的。奧國之創尙新，英爲要接收海峽，它剛列抵抗，一部艦隊，遂遭毀滅，千餘法海軍蒙難，其言評此事作爲「鼠胆之攻擊」，他與英絕交。這雖其言其健忘。是以法艦隊投入英國之懷抱，是希特拉之噩夢，惟此

## 悵

## 鬱

秋天生長在淡淡的稻花香裏，成熟于載指的稻芒上。秋天總不免有些悵鬱，成熟的稻穗也低垂了頭！

時近黃昏，夕陽在西方燒起餘火，地面一切都薄薄的一層金。在鬱鬱似的常青樹梢上勾動起一道金邊，蒼翠綠的，靜靜的。

銀子像鳥兒醒來，醒在重露的枕上，飄飄的有點異樣的安適，然而又似有所失悔，失悔爲什麼丟了那些未圓的夢；什麼夢？沒有的，只不過是些不可捕捉的迷離的幻想影子罷了。一個生物成熟的徵象。

——青青的遠樹後冉冉的暮靄。

銀子漫不經心的走着，沿着恬靜的溪流，輕輕地叫喚着自己名字；

「銀子，銀子，……痴了頭！要真是寶貝，爲什麼你娘不叫你做金子？」

她心裏藏着一點秘密的喜悅，不願意給人知道。並且像連自己都不給知道似的，一淌淺笑鑲上她的臉。

夢斷不易實現。至於與敵高築合作，非惟不易，亦無大作用。在非洲建國嗎？惜法無一如英屬加拿大一幟之屬土，本身就是強國，工業農業能均發展。法艦當可開往非洲，但祇恃艦隊，不能把沙漠，變成伊田園。

不管法國態度強硬，這次政潮，並非反對之表示，佛蘭亭之出任外長，可知法對德之態度，仍是和緩的。我們若非健忘，當知「慕尼黑會議後，奧會特電希特拉致賀，因而爲法內部各界所不滿。自法潰敗以後，佛蘭亭即不與奧德兩國保持接觸，賴伐爾首次自巴黎見德國代表時，即值德方代表正與佛蘭亭會談，賴伐爾乃不得不在側室坐等，此事頗引起各方之譏諷」。佛蘭亭是親德的。

現在法國之問題，不是親德與否之問題，而是怎樣利用德德來換得民族生存之條件。法對德之態度強硬，顯示其已感覺世界大局其已得順轉，意大利攻英之失敗，德國渡海之無成，使法國之力量，成軸心國之絕引誘，利用軸心需求法國援助之心理，獲得法國人生存之條件，是法國今日外交活動底重心之所在。 民三十年，一，八日成都

## 汪會祺

她走着，眼睛跟着自己的腳尖。這腳尖，小小的，可以把她帶得多遠！究竟能走多遠？她想問問自己，但是她不願意自己回答，默默地，她又笑了。

說了怕人知道，也怕自己知道。還不是走到——那個坪裏！

脚下是帶綠的淺草，有的也已紅了心，茸茸的，被西風剪得很齊，朝露洗得很乾淨。

她很耐心的尋找，看看有沒有馬齒咬過的印子。彷彿覺得有一匹渾身柔潤如天鵝絨的長鬃，嚼着草，踢着蹄，悠然拂弄修齊的尾巴。馬在那兒呢？她樂意有那麼一匹馬。

陌頭騎着一頭倦斃的牛，她心裏想：笨東西，我不歡喜看見你囉，你太笨，太懶，太……讓你早上自己走出來，晚上再自己走進欄裏去，甚至還想拾一塊青鵝卵石扎她一下，因爲牛角上正晒了兩隻八哥兒，那麼從容自在，那麼得意，竟想甜甜地做一個夢。但是他沒有這麼作。這草裏一担平，不會有石卵兒。也許有吧，可是她不再找了，多費事。



草坪附近那沒有人影，洗淨了泥腿的人早給高挑的酒精兒招去了。噢，連馬鞍的聲音都不聽見，世界這樣清靜，究竟是什麼意思？

這已經出了莊了，銀子左手在前，勒住繮韉，右手在後，抓住鞭兒，嘴裏一聲「哈！哈！」馬來了，得得得……一氣跑了不知多遠。她停住了。唉，不像！怎麼兩腳總不騰空？

馬累了後得氣息，飲點水，于是她大步走下土坡，坐到最下一級，今兒這坡忽然像是嫌寬了些。比往常寬，也比往常靜。

河水清極。水裏一處有兩隻黑晶晶的大眼睛，怔怔的對着她。

嗨，這胸前爲甚麼起伏得這麼劇，跳甚麼？春天的花過去了，夏天的雲過去了，秋天的一把白頭狗尾草在風中搖，誰家葡萄園不採摘葡萄釀酒？無意又似有意的，她的手觸到自己的胸脯邊，忽然無端的紅起臉來。心子飛到什麼天上去？人都說有三十三重天！飛去了怎麼回來，多遠的路！

「！！」銀子，很害羞的往坡上草裏一伏。

「！！」一隻青椿兒飛過去了，她笑銀子。有什麼好笑的？銀子知道。

銀子回去了，她聽得媽媽叫「銀子，銀子，！！回！來！啞！」的聲音，漸漸歸去了，媽也曉得銀子一定會聽見的，她只是不答應罷了。其實她正心中想到好笑：一天銀子銀子的叫，應當發一百萬財！可是一個金戒指還換掉了。

隔山有人吹着簫管，把聲音拉長，把人的心也好像拉長了，她痴了一會兒，很想唱唱歌，就曼曼的唱着：

一第一香櫛第二蓮

第三檳榔個個圓，

第四芙蓉五桂子，

送郎那要得郎憐。」

好像又有誰在接口唱：

「天上起雲雲重重，

地下埋墳墳中墳，

嬌妹洗碗碗山碗，

嬌妹床上人重人。

狗嘴裏說人話，不像人。」

門外場上被風兒掃得平平的，除了一兩片落葉掠過留下的殘條外，只有幾個腳印，那是媽媽底，銀鈴兒將插來一把狗尾草，不高興似的恨恨的一撒。她高興？她怎麼不高興？快吃飯了。

內政部 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六九〇七號  
雲南圖書審查委員會審字第三四三號

飯已經擺到矮桌上，爸爸喝着一小杯酒，銀子呆呆的注視着爸爸喝一口，吮一吮鬍子。她不說一句話，像是不動筷子。

「銀子成人了，」爸爸媽媽看着，默默的笑笑。媽媽撥一撥眉。若在往常，她非得往爸爸懷裏一撞，問他「笑些甚麼」不可。但是今天她不想問。她心裏想：「你們笑我，不回來，明兒！我會跑，跑到遠遠的天邊，看媽再會不會叫『銀子！！回！來！啞！』」銀子一走，你們我金子去。」

突然，她把「子」往下一放，飛奔的跑出門外去了。外面的天寬寬的，罩着大地，地面一切都成熟。

得得得……明明聽見的嗎？

銀子向林子裏跑去。今天好像甚麼都欺負她。她要去林子裏哭一會兒。她要看看那匹馬。

### 本期撰者

陳序經先生主張全盤西化，數十年如一日，其主張是不游移。我們今特將其長文一期發表，庶有意參加討論此基本問題的論者可以及早應戰。蔡標衡先生的文章本已草成多時，今與陳文一同發表，因原文的內容，少不連度。

###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報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華山南路一六五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華山南路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二角 訂閱全年八元 半年四元（香港以港幣計算）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或折成美金五元）